



劳动经济管理干部中等专业试用教材

人口学知识



劳动人事出版社

劳动经济管理干部中等专业试用教材

人口学知识

劳动人事部人事教育局 组织编写
上海市劳动局

张开敏 主编

劳动人事出版社

本书由劳动人事部人事教育局与上海市劳动局共同组织编写，是供劳动经济管理干部使用的中等专业试用教材。

本书系统地通俗地介绍了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人口理论的发展、人口变动、人口分布、人口与经济、人口与社会、人口与环境、人口政策、人口统计、人口预测、世界人口等内容。

本书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开敏同志主编，杨舒、沈安安、张鹤年、张康清等同志参加编写，上海市委党校教务长王建民同志负责审稿，徐东明同志作了编辑加工。

本书还可供从事人口管理的实际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教学人员学习参考。

人口学知识

劳动人事部人事教育局 组织编写
上海市劳动局

主 编 张开敏

责任编辑 余炳荣

劳动人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和平里中街12号）

大同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25印张 226千字

1988年4月北京第1版 198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 850册

ISBN7-5045-0144-1/F·028（课） 定价：1.80元

前 言

为提高国家机关干部的文化和专业素质，中央要求国家机关所有干部在几年内要达到中专以上文化水平。对不具备中专水平的，要进行正规化培训，经考试，及格者发给中专毕业证书。

发展干部中专教育，是干部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层次，是培养中级专门人才的重要途径。为了尽快使全国劳动经济管理干部队伍在文化和专业结构上趋向合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由劳动人事部人事教育局和上海市劳动局、河南省劳动人事厅组成了劳动经济管理中等专业教材编写领导小组，组织华东政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财经大学、上海市机电工业学校、河南省财经学院、铁道部郑州干警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等有关单位的专家、学者和经验丰富的实际工作者编写了劳动经济管理专业干部中专试用教材。这套教材共十本，有：《经济管理学概论》、《劳动经济管理》、《劳动统计》、《法学知识与劳动法》、《电子计算机应用》、《劳动心理学知识》、《人口学知识》、《劳动保护管理》、《劳动保险与福利》、《劳动社会学知识》。

劳动经济管理干部中专教材，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论联系实际，体现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经济

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服务的根本宗旨。教材从在职的劳动管理干部的实际出发，注重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阐述和介绍，做到了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三者结合，既照顾了知识面的深度和广度，又突出了重点，内容深浅适度，简明实用，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这套教材既可作劳动管理干部中等专业教育的教材，也可供全国各行各业从事劳动管理工作的同志自学考试，自修研究之用。

这套教材在编写、出版过程中，承蒙各位编写人员的大力合作和有关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感谢！

劳动人事部人事教育局

1987年10月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人口理论的发展	(3)
第一节 古代人口思想	(3)
第二节 资产阶级人口思想	(9)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	(17)
第二章 人口的变动	(24)
第一节 人口的自然变动	(24)
第二节 人口的迁移变动	(45)
第三节 人口的社会变动	(54)
第三章 人口与经济	(61)
第一节 人口与生产	(61)
第二节 人口与消费	(73)
第三节 人口投资	(86)
第四章 人口与社会	(94)
第一节 婚姻与家庭	(94)
第二节 人口素质	(104)
第三节 就业问题	(112)
第五章 人口与环境	(122)
第一节 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	(122)
第二节 人口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131)
第三节 环境污染的防治和人类的未来	(144)

第六章 人口分布	(152)
第一节 人口分布及其影响人口分布 诸因素	(152)
第二节 人口分布的概况	(165)
第七章 人口政策	(180)
第一节 我国人口政策的形成和发展	(180)
第二节 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190)
第三节 城镇人口的发展与控制	(197)
第八章 人口统计与人口分析	(203)
第一节 人口统计资料的来源	(203)
第二节 人口统计及其指标体系	(211)
第三节 生命表	(229)
第九章 人口普查	(241)
第一节 人口普查的作用和简史	(241)
第二节 人口普查的项目和方法	(247)
第三节 人口普查的组织工作	(256)
第十章 人口预测	(264)
第一节 人口预测的基本方法	(264)
第二节 人口预测	(277)
第三节 计算机在人口预测中的应用	(301)
第十一章 世界人口	(306)
第一节 世界人口的增长	(306)
第二节 世界人口的现状	(309)
第三节 世界人口前景	(316)

导 言

人口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是，它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无论中国、外国、东方、西方，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和学术界对人口的总数和变动给予很大关注。对人口的看法常常是统治者施政纲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学术观点中的中心内容，历史上的人口变动也总是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形势密切相关。史籍中有关人口的记载是研究政治史、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珍贵资料，它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状况及特点。近代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中期以后，经济的飞速增长促使人口的剧烈发展。在新的形势下，人口学突飞猛进地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内容大为充实，领域更为宽广，成为一门关联到诸多方面而又自成体系的重要学科。

人口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口的变动及其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所谓人口，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区域范围之内，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群的总体。人口的增殖具有本身固有的自然属性，同时人口又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因此必然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人口的变动，不仅包括人口规模的增减和组成人口总体的各个部分之间比例的消长（即人口构成的变化），还包括着人口地理分布以及人口素质等方面的变化。人口的变动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彼此依存，互相制约，存在着极其复杂的有机联系。为了正确地进行探索，人口学的研究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熟悉有关的

专业知识，并掌握必要的科学方法。与人口学密切关联的学科既包括社会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生物学、生态学、数学、计算机技术等。在专门研究的基础上，当代人口学又衍生出许多分支学科，如人口理论、人口统计学、人口经济学、人口社会学、人口生态学、数理人口学、人口史、人口地理、人口系统工程等。

由于人口学与社会、经济活动之间联系的广泛性，学习人口学有助于全面了解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党和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减少工作中可能发生的片面性和盲目性，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

研究人口学的目的则在于全面了解人口变动的现状，并预见人口变动的前景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咨询，为各个部门的工作提供制定发展规划的依据，促进人口的变动与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保证全体人口生活素质的不断提高和改善。明确这一中心思想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人口学的内容及其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

第一章 人口理论的发展

第一节 古代人口思想

一、中国古代人口思想

早在西周初期，统治者对人口计数和登记就相当重视，把众多的人口看作是国力的根本。当时流传着不少赞颂多子多孙的诗歌，有些后来被载入了《诗经》。春秋战国是我国古代思想活跃、学术繁荣的时期。在这时期中虽然还没有产生专门论述人口的著作，却已经出现了十分鲜明的人口思想，并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孔丘和孟轲所提出的对人口的一系列观点。

孔丘（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极力提倡众民之说，也就是主张多生多育、增殖人口；孔丘的人口思想后来又由孟轲（公元前327～公元前289年）加以补充发展，并且得到了历代王朝的采纳赞扬，影响深远，在我国民间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生育观。

孔丘主张增殖人口的观点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基础的，他提倡孝道，认为子女对父母的尽孝不仅要包括对父母生前的侍奉，还应当包括对父母身后的祭祀，才能符合他所制定的“礼”。根据他的观点，要求子女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在死亡率很高的古代，多子多孙则是使祖先祭祀不致中断，永远延续的可靠

保证。后来孟轲据此而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说法，成为封建生育观的中心支柱。

孔孟都认为人口的繁庶是政治开明、国力强盛的表现。他们不仅赞扬多生多育，还主张通过施行“仁政”以招徕外来人口迁入本国，做到“近者悦，远者来”，增强国力，孟轲曾说：“民归之，犹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所以孔孟的人口思想也反映了他们的政治主张。

值得注意的是，孔丘在指出了人口增殖、数量繁多之后，还应当关心全体人口的生活和教育问题，《论语》记载：有一次孔丘访问卫国，见到人口众多，表示赞美说：

“庶矣哉”！他的学生冉有问道：“既庶矣，又何加焉？”就是说，人口多了，怎么办？孔丘回答说：“富之”；冉有接着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就是说，富了以后又怎么办？孔丘回答说：“教之”。后来，孟轲对这些主张又加以发扬光大。这些观点不仅在当时可以说是难能可贵的，即使在现代也仍然是人口学中不可忽略的重要思想。

生卒年月介于孔孟之间的墨翟（约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非常重视增殖人口。由于当时人民生活困苦，死亡率很高，他痛感“唯人难倍”，即人口不易增加，而主张采用早婚、节用、非攻、节蓄、节葬等办法来增加人口，也就是要使人民生活安定，反对战争，并且反对富贵者纳妾和居父母之丧三年不许结婚的规定，籍以降低死亡率，提高生育率。

生活在公元前390～公元前338年的商鞅，长期执政于秦国，他的人口思想是他的政治主张的重要部分。商鞅从强兵的要求出发，力主增加人口。他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为了迅速增加人口，充实国力，他主张招徕其他

国家移民，开垦土地，以达到秦国富国强兵的目的。商鞅还强调人口与土地之间必须互相适应，使人力和地力都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春秋战国时期还有许多思想家都是赞成众民之说，主张增加人口的。这除了上述的各种政治的、伦理的原因之外，主要是因为那个时期大部分地区地广人稀，土地尚未充分开辟，足以容纳更多的人口。

但是，生活在战国末期的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年）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首先发表了人口的成倍增长造成了人口与财富之间的比例关系不相适应的论点，认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妇女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人民少而财有余……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指出人口增长过多导致了生活的艰难。韩非还认为国家的强弱不在于人口的多少，而在于政治的修明和财富的丰盛，即“存亡在虚实，而不在众寡”。韩非的这些观点在学术上具有一定地位，在历史上也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因为这时的韩国已经感受到人口增多，土地不足的问题。

此后历代虽不乏对人口的议论，但很少有新的创见。宋代的苏轼（1036～1101年）和叶适（1156～1223年）都提出了平均人口分布的问题，即所谓均民之说。苏轼认为人口过多无益于国家，反而人多成患，以致百弊丛生。他主张“因人之情，因时之势”，趁灾荒的年头动员人口密集地区的人口迁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并且建议由士大夫带头迁移。叶适则认为，人口众多，国家才能强盛，但是人口分布不均，土地不能充分利用，则不能收到人多之益，必须把人口过剩地区的人口移到人口稀少的地区去开垦土地。他建议“分阡

广以实荆楚，去狭就广”，即把福建广东的多余人口迁移到湖南、湖北人口较少地区。他们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当然很难实现。

宋元之际的马端临(1254~1323年)是我国古代对人口统计有突出贡献的学者。他整理了大量人口统计资料，指出前代人口统计数字的不实之处，并且十分重视人口数量和质量之间的关系，强调人口素质的重要作用，认为“古者人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麻惰之辈”，人口增长过多适足以妨碍人口素质的改善，影响社会的发展。他指出：“民之多寡不足为国之盛衰”。这些看法虽然不免有些偏执，但是马端临反对单纯追求人口数量的增殖而忽视人口素质改善的观点却是十分值得注意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对南宋空有众多人口，终遭亡国的深切感受。

清代前期全国人口有了成倍的增长，人口与耕地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活在清代中叶的洪亮吉(1746~1809年)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清代中期的人口“视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视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视百年、百数十年以前不啻二十倍焉”；而土地、房屋“亦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人口的迅速增长，使得“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产生了人口过剩，耕地不足的问题，“为农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为商贾者十倍于前而货不加增”。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劳动人民深受其害，难逃冻饿之苦，“终岁勤劳，毕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沟壑之忧”。因而他提出“天地调剂法”和“君相调剂法”来解决人口过剩问题。前者即通过灾荒、疫病等自然淘汰以减少人口；后者即通过政策来调整人口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包括发展生

产、移民开荒、减税节用等方法来缓和人口问题。洪亮吉的人口思想反映了清代中期的社会问题和经济政治形势，但他没有触及封建社会的本质，他的“君相调剂”之法当然也是不能实现的。

二、外国古代人口思想

古代希腊人赞美多生多育，公元前四、五世纪时，希腊的人口已经相当稠密。当时的大思想家柏拉图(公元前429～公元前347年)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年)反对人口的过量增加。他们从奴隶主的利益出发，主张通过国家干涉，将城邦的人口控制在适当的规模。他们认为人口问题的解决不在人口总数的增减，而是要求维持人口的静止状态，即人口总数不增不减。柏拉图甚至明确提出一个理想的城邦国家的人口数应当是5040人，并且主张通过法律手段来调节生育数和移民数，以永远保持此数不变。亚里斯多德则认为“最完善最美丽的国家即是能够维持人口数目使之不超出一定限度的国家”。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还主张保持人口的一定质量，他们都很重视儿童的教育和体格的健壮，对于残疾儿童则认为应当抛弃。

但是，他们所说的人口只是指希腊城邦国家的自由民，并不包括奴隶在内，在实行奴隶制的古希腊时代，奴隶仅被看作为财产，当然不厌其多。

古罗马的执政者通过立法手段来实践他们的人口思想，对独身者课以重税，并在财产权和其他权利方面优惠多子女者，鼓励结婚和生育。

古代东方民族则几乎一致赞美人口繁盛，奉行多生多育。除了若干宗教僧侣实行独身禁欲外，世俗习惯都以独身

为耻，以多子为荣，很少有持不同见解的人口思想家。这种鼓励人口增殖的思想主要是出于对劳动力和兵员的需要以及古代东方民族对祖先的崇拜，把繁殖后裔看作为人生的首要责任。

中世纪欧洲的人口思想受到宗教教义的重大影响。宗教教义虽然主张僧侣独身守贞，但是并不限制世俗的婚配，并且提倡贞操道德，维护家庭稳定，这些主张都有利于人口的增殖。

13世纪著名的经典师圣托马斯（1227~1274）明确反对亚里斯多德关于维持人口规模不变的主张，他认为人口一定会增加，至于增长的快慢则主要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人口越多国家也就越繁盛。他说：“生育子女最多的家庭对于国家是最有益的家庭”。

生活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的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1483~1549年）则反对僧侣独身不婚的规定，认为结婚和生育是正当的行为，只要遵循上帝的指示，一定可以丰衣足食养育儿女。这反映了正在欧洲兴起的重商主义的人口思想的要求。

16、17世纪在欧洲出现了重商主义理论，这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本利益的经济学说。他们认为金银才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为了取得金银必须开采矿藏，并且还要发展对本国有利的对外贸易。而为了增加出口商品换取外国的金银，则必须发展国内的手工业生产。因此，重商主义十分强调增加人口的好处，认为增加人口就可以增加出口商品的生产，换取金银，增加国家的财富，拥有大量人口对国家是有利的。这是重商主义在人口方面的基本观点。

意大利早期的重商主义者鲍泰罗（1540~1570年）认为

人口是国家财富的来源，要增加人口一方面必须提高结婚率和出生率；另一方面还应当设法降低死亡率，特别是降低儿童的死亡率。但鲍泰罗又认为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资料的增长不成比例，人类生殖力是无限的，土地生产和从其他国家取得生活资料的能力却是有限的，一个城市国家对人口供养力的增长赶不上人口的增长。因此，他主张人口的增长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当人口繁衍到相当稠密时就不能再超过供养力的界限，而必须维持在一定的数量。

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波丁（1530～1586年）提出“永远不要忧惧人民数目的过多”，因为只有人力才能致富。巴蒂斯·柯尔倍尔（1619～1683年）则主张通过奖励生育和奖励移民入境来增加人口，同时还应当奖励年轻人口从事生产劳动，以增加财富。当时欧洲许多国家都严格禁止移民出境，对私自出境者处以重罚，对协助或引诱本国人口私自出境者，甚至处以死刑。

英国重商主义后期的重要代表詹姆士·斯图亚特（1712～1780年）除赞成人口增加以外，还认为人口的增殖必须和生活资料生产的增长保持平衡，人类的自然繁殖力会破坏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要扩大生活资料的生产就必须有积累，没有积累，人口增殖是不可能的”。

第二节 资产阶级人口思想

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人口思想

17世纪以后，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迅速壮大，出现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古典经济学派，他们在人口思想方面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人口理论。

早期的古典学派一致赞成增加人口，他们认为劳动是财

富的源泉，人口多则劳动力多，生产的财富也越多。英国的威廉·配第（1623～1687年）是古典经济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可以反映他的人口思想的主要内容。威廉·配第对于人口统计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贡献，他对人口死亡率、人口年龄构成、性别构成、行业和职业构成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他特别注意人口和土地的关系，认为“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八百万人口的国家比面积相同而仅有四百万人口的国家，其富裕程度不止一倍”。他还注意到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之间的比例，主张提高生产人口的比例。他又指出人口稠密地区的经济发展快于人口稀少的地区，因为人口稠密地区可以有较细的分工，劳动生产率比较高，有利于节省生产和管理费用，降低成本。

英国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号称经济学之父的亚当·斯密（1723～1790年）生活在英国产业革命的初期，他的人口思想组成了他的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即主张增加人口以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一国繁荣最明确的标志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因为增加人口才能增加劳动力，于是才能增加财富。另一方面，他又认为财富的增加反过来又能促进人口的增加，而且一国的财富只有处在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才能促进人口的增加；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人口不可能增加。亚当·斯密人口思想的中心内容可以说是“工资决定人口”，即人口数量的变动受到对劳动力需求数量的影响，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支配着人口的生产。他认为商品的供求是由价值规律调节的，人口的供求则由工资规律调节。他并且举例说，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人口增加一倍需要五百年以上的时间，而在当时北美洲的英